

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苏课题组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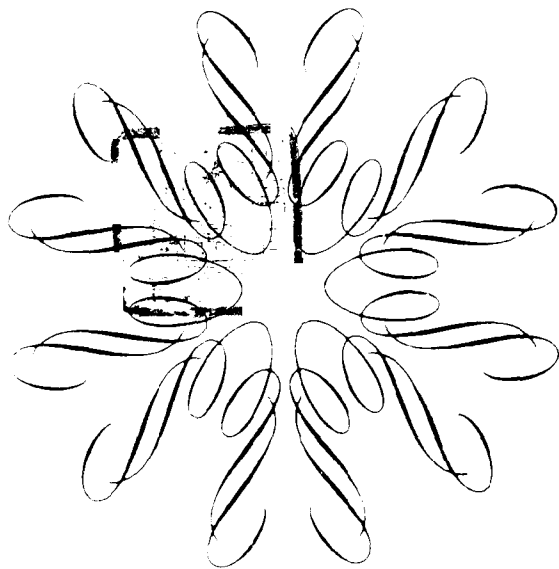
论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

江苏教育出版社



论陶行知 师范教育思想

《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苏课题组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论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
《陶行知系列研究》江苏课题组
责任编辑 吴为公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淮阴市淮海北路44号，邮政编码：223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5 字数 168,600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册

ISBN 7-5343-1211-6

G·1070

定价：2.55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1
第二章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28
第三章	师范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49
第四章	广义师范教育	61
第五章	乡村师范教育	73
第六章	师范学校与中心学校	85
第七章	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	101
第八章	师德修养	117
第九章	师范教育的课程和方法	131
第十章	师范教育的试验和研究	149
第十一章	师范教育的领导和管理	160
第十二章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180
后记		214

第一章 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为救国救民，为改造传统教育、洋化教育，建立适合国情的人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他在改造中国教育的实践中，特别注意师范教育这个重要环节。他在筹办晓庄师范时曾经表示：“我从前曾经为师范教育努力。现在正是为师范教育努力，以后仍是继续为师范教育努力。”

（《陶行知文集》以下简称《文集》167页）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晓庄师范开始试验和逐步形成的。陶行知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拓人民教育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质，更是师德的光辉典范。他在师范教育领域中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

为了借鉴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师范教育事业，我们在具体阐述他关于师范教育的各个重要思想观点之前，有必要首先从总体上考察一下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从提倡“新教育”到初步形成自己的师范教育思想体系

（1917—1926）

陶行知出生在清朝末年。那时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

掠夺，日甚一日。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爱国之士无不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力谋救亡图存。1907年陶行知在徽州崇一学堂上学时曾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辛亥革命以后，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写的毕业论文中，力主民主共和。“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而“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1915年陶行知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1917年他离美回国，曾表明他的志愿就是“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可见陶行知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立志为国为民从事教育工作了。

1917年9月，陶行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后，他担任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直到1923年8月，陶行知的教育实践，是在师范学校开始的。在此期间，陶行知着手考察中国教育的现状，探索中国教育改造的途径，他主张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推行学生自治，提倡女子教育和“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但从他那时着重提倡的“新教育”看来，还是以引进美国的，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的教育观点和方法为主。在师范教育方面，他那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有：

一、要从关系国家前途的高度，充分理解师范教育的重要性。

陶行知认为，国民的素质是“立国的要素”。而“要造成适当的国民，须有适当的教员”，教员的养成，又靠师范教育。所以，“师范学校负培养、改造国民的大责任。国家前途的盛衰，都在他手掌之中。”（《陶行知全集》（以下简称《全集》）1卷166页）

二、“我们应当有广义的师范教育”。（《文集》46页）

陶行知认为我国教育行政人员、办学指导人员没有经过必要的培养，是教育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师范教育不能限于培养教师。凡教育界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如教育行政人员、教育

视导人员、学校行政人员、各种教员、还有教育研究人员，都应该培养。

陶行知还强调在职教师的进修，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广义的师范教育。这里面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未受过师范训练的教师。“要求办师范教育的人给他们补充学识的机会”。（《文集》49页）

（二）对已经毕业的师范生，“师范学校有继续培养的责任。”（《全集》1卷169页）

（三）对所有在职教师，“当使有进步的机会。……能进步，然后教材才丰富。教授法才生动”。（《全集》1卷119页）

三、“应培养乡村教员，以应济乡村的特别需要”。（《文集》46页）

陶行知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师范多设设城市，……乡下学生入师范后，都不愿在乡下做事”。因此主张“好多师范学校，应当设在小镇上”，一方面接近乡村环境，一方面可以得到在乡村实地教学的机会。（《全集》1卷172页）

四、师范学校要办得具有师范专业的特点。

陶行知认为，师范学校首先要培养学生具有专业精神。1919年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讲演时指出，办“新教育”的新教员，第一、“要有信仰心。”认定教育是大有可为的事。要造新国家、新国民、新社会非此不行。第二、“要有责任心。”要以全国人人都能受到教育为己任。第三、“要有共和精神”。事事要和学生同甘苦，要和学生表同情，参与到学生里面去指导他们。第四、“要有开辟精神”。到乡下去，到边疆去，开辟教育事业。第五、“要有试验精神”。这样，对于教育问题，才有彻底的解决；对于教育原理，才有充分的发现。

陶行知还批评“现在的师范学校，大都是中学校的变形，不过稍加些教育学、教授法罢了。毕业以后，就拿这些教材（指小学

教材——本章作者注）去教学生，恐怕还是门外汉呢。”所以他主张小学要用怎样的教材，师范生就要怎样去学。“一方面要学‘学’。一方面要学‘教’。”同时，“师范学校担任专科的教员，应注意各科教材教法。”师范和附属小学要密切联系。“附属小学不但是实习的地方，简直是试验教育原理的机关”，是“教育学的试验室”。（《全集》1卷168—169页、172页）

五、要办好教育（包括师范教育），就要重视教育研究，提倡教育试验。

陶行知认为：“教育之举措，悉当根据学理，学理幽深，研究始明。”研究的方法，在取得人类已有的知识方面，一曰交谈问答，二曰读书。在探索人类尚未明了的新知识方面，一曰观察，二曰试验。（《全集》1卷66—67页）他指出我国教育之所以旧者五。一曰依赖天工。二曰沿袭陈法。三曰率任己意。四曰仪型他国。五曰偶尔尝试。因此，格外需要提倡教育试验，“既能塞陈旧之源，复能开常新之道。”（《文集》9—11页）

陶行知本人就是身体力行这些教育研究方法的榜样。他虚怀若谷，善于和别人切磋讨论。他勤奋读书，不断汲取古今中外的知识宝藏。他重视调查研究，深入考察教育实际和社会实际；从事教育试验，更是孜孜不倦、百折不挠。统观陶行知的一生，其教育思想和实践之所以能不断发展，进步，日新又新，原因固然很多，但他的治学严谨，坚持研究和试验，不失为重要契机之一。

然而那时候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从总体上看，同他所提倡的“新教育”一样，还是以引进杜威的观点和方法为主，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2页）所以杜威对师范教育是很重视的。

但是杜威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否认存在对思维的第一性，一味强调实在的可塑性，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杜威不问政治前提，无条件地声称“学校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最基本的和最有力的工具”，《杜威教育论著选》第12页）也是不对的，他的这些错误观点，曾经给予陶行知一定的消极影响，这是陶行知回国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尽管努力从事教育实践，却不能达成预期目标的一个重要的认识根源。

陶行知这一时期的师范教育思想，正确地阐明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针对我国师范教育中的一些弊病，提出了积极的改进办法。值得指出的是，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因而强调作为“教育之本”的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他把师范教育提到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高度，这个见解是极为深刻的。

1923年8月以后，陶行知又致力于推行平民教育。为了解决平民教育中所需要的师资和其它教育人员问题，陶行知从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出发，根据他调查各地做法和亲自试验所得的经验，提出了以下一些办法：

第一、要训练推行平民教育的干事，从全国到省、区、到县、市、到乡、街，上一级平民教育促进会都要派合适的人到下一级组织去负责训练，指导他们推行平民教育。

第二、要训练省、县视学。他们是地方上提倡平民教育最能收效的人。要给他们办短期的讲习会，详细讨论推行平民教育的办法。

第三、要训练教师。平民学校的教师，可以由小学以上的教职员、中学以上的学生、16岁以上的高等小学生、40岁以上受过小学教育者、平民教育第一期毕业生之成绩优良者等等担任。但要加以训练，可以采用讨论会的办法，寓训练于讨论之中，平民读书处，要打破“非师范生不能办平民教育”的迷信。可以用“连环教学法”：1个助教教2个人，这2个人又成为第二代助教，各自

再教2人，那4个人又成为第三代助教，各自再教2人。这些助教也要加以训练，如每星期训练一次，并给以定期指导。训练教师，农村用巡回法，市区可以集中。

由此可见，随着陶行知的教育实践，从在学校里提倡“新教育”，转到走向社会，开辟推广平民教育的道路，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也从以引进杜威的观点和方法为主，转到从中国国情出发，自己创造培训平民教育人员的办法方面来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这一时期在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陶行知自小生长在农村，家境贫寒，上中小学都曾靠免费和别人照顾，14岁还常跟父亲挑菜进城，并帮助母亲做佣工；后来来到南京上大学、到美国留学，也是靠家里节衣缩食、自己勤工俭学和旁人的资助，才完成了学业，但回国后当了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了，经济收入多了，他后来曾自己取笑说，那时他已成了“中产阶级”。可是，到推行平民教育的时候，同平民的接触多了，对平民的疾苦了解深了，他的思想感情又起了变化，觉得自己不完全象个中国人了，同平民有了距离。他说：“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文集》64页）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平民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不仅是一个爱国民主知识分子，而且有了回到劳动人民队伍里来的自觉要求。

然而，这时陶行知认为平民教育提倡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老板教学徒，财东教佣工，太太教丫头，官僚教下属，不仅可以使平民识字，而且可以使老板、财东、太太、官僚等等“平民化”，这种打通阶级壁垒的教育，可以打通社会上的阶级壁垒，也就是他所说的：“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文集》64页）。他的这种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陶行知的愿望相反，推行平民教育的结果，距离原定的目标很远很远。后来陶行知说，城市平民教育最大的阻力，还是老板、管事不允许工人学习。据《中华教育界》的编者说，那时候一

些军人、政客只是利用平民教育沽名钓誉，哪会真正关心让平民读书识字的事，所以轰动一时之后，除了还有几处挂着平民学校或平民读书处的空招牌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陶行知培养平民教育人员思想，在当时并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可是他毕竟开辟了一条为扫盲教育培训教育人员的路子，这是应当肯定的。

与此同时，陶行知在提倡“新教育”时期所倡导的师范教育思想却对我国师范教育界产生了影响。到1924年，我国师范学校的专业特点有所加强，对培训乡村教师也愈来愈强调了，如江苏省五所师范都设立了乡村分校和分校附小。1925年上半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六个教育团体和单位共推陶行知筹办一所培养乡村教师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那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掠夺下，民族工业陷于停滞，农业生产日益下降，加以军阀混战，水旱频仍，所以陶行知说：“全国国民简直是在天灾人祸、内乱外患里翻筋斗，大家弄得个朝不保夕”。（《全集》1卷546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陶行知于1925年8月提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应当具体实验“以乡村学校为改造乡村生活之中心，乡村教员为改造乡村生活之灵魂”。（《全集》1卷556—557页）

1926年春，陶行知为了筹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农业教授邵仲香，共同调查沪宁铁路附近乡村学校的状况。

陶行知在倡导教育试验时曾批评过旧教育“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等等，通过这次调查，陶行知对旧教育的了解更加具体，批判也更加尖锐了。他说：“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忍受土匪、土棍、土老虎的侵害而不能自卫，遇了水旱虫害而不知预防。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他认为这种教育害

国害民，高呼“前面是万丈深渊，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全集》2卷1页）他批评“好些师范学校只是在那儿讲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大书呆子分布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他希望“师范学校从今以后再不制造书呆子”，“已经成了书呆子的，从今以后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的炉里重新锻炼出一个新生命来”。（《文集》167—168页）

通过调查，陶行知也发现了一些接近乡村生活、办得比较好的乡村学校。他认为“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开原小学，都是著有成绩的乡村学校。最近改造的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明陵小学，笆斗山小学，成绩也有可观”。（《文集》150页）其中燕子矶小学，1924年曾被陶行知誉为“不但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是一所“改造学校，改造环境”的活学校。（《文集》106—107页）1926年，陶行知又盛赞开原小学，有“最切实的方法引导学生组织积极的活动”。（《文集》131页）1926年9月，陶行知在江苏省教育会上说，乡村校长应当具有三项素质：1. 有农夫的身手。2. 有教师的头脑。3. 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他特别赞赏江宁县立师范学校“见义勇为”，能马上按照这三项目标“来实地训练学生”，使他对改造乡村生活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文集》115页）

1926年底，陶行知在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等一系列著作，系统地阐明了即将开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指导方针和实施办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比过去更加丰富，也更加具体了，其主要内容是：

一、以生活教育的观点，说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是培养国民具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生活力的国家万

年根本大计，而“有生活力的国民，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所以，师范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命运。“中国今日教育最急切的问题，是旧师范教育之如何改造，新师范教育之如何建设”。

（《文集》141页）

二、运用生活教育的原理，阐明师范学校的任务和建设过程。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法学法做法要合一。所以，师范学校的任务是：“运用环境所有、所需的事物，归纳于他所要传播的那种学校里面，依据做学教合一的原则，实地训练有特殊兴味、才干的人，使他们可以按着学生能力、需要，指导学生享受环境之所有，并应济环境之所需。”（《文集》136页）建设师范学校的过程是，“自然社会里的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师范学校；活的师范学校产生活的教师；活的教师产生有生活力的国民。”（《文集》138页）

三、依据办得较好的学校提供的实际经验，并吸收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若干格言，启发师范学校应使他们培养的教师，能够：

（一）“以身作则”。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三）“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

（四）“做人民的朋友”。

（五）有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集》144页）

四、从改造乡村生活的角度，阐明乡村师范的积极功能及其应有的培养目标。

“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文集》144页）“要有好的学校，先要有好的教师。”好的教师，是要靠师范学校“用特殊的训练把他们培养

成功的。”乡村师范要“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全集》2卷3页）使他们“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文集》150页）“能依据教学做合一的原则，领导学生去学习那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本领”，“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文集》142页）能常常念着农民的甘苦，把整个的心献给农民，“为农民服务”。（《文集》143页）

五、依据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提出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文集》151页）

师范学校的课程，大致可分为：

（一）中心学校活动教学做

中心学校以实际生活为中心，又是师范学校的中心。“中心学校有了办法，再办师范学校”。它“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传播中心学校的精神、方法、和因地制宜的本领”。师范学校的各门功课，“大部分都应当与中心学校联串起来”。（《文集》137页）

（二）中心学校行政教学做

广义师范教育不仅培养教师，还要培养校长、辅导员，一般教师也应具有参加学校行政工作的能力。

（三）分任校务教学做

学生要分任师范学校的文牍、会计、总务、洒扫等工作，还要学会烧饭、种菜。

（四）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

包括科学的农业、基本手工、卫生等教学做。

（五）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

包括村自治、平民教育、合作组织、乡村生活调查、农民娱乐等教学做。

六、在教学做合一的基础上，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

师范学校各科教师都称为指导员。他们指导学生教学做，与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师生共生活、共甘苦，是最好的教育。高级程度学生对低级程度学生也要负指导之责。

由此可见，陶行知在筹建试验乡村师范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师范教育思想体系。

在晓庄师范的教育实践中，提出自己的 生活教育理论

(1927—1930)

1927年3月，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正式开学。在晓庄师范时期，陶行知已经不只是提倡“新教育”，也不只是在南京高等师范一个学校里进行很有限的局部改革，而是在南京郊区以晓庄为中心的方圆四十里范围内，进行乡村教育的全面改革，以及改造乡村生活的试验了。这种试验，已不是像推行平民教育时期那样，一边开辟事业，一边摸索经验(包括培训教育人员的一些经验)，而是有教育理论作根据，制订了一套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实施办法然后进行的了。

这种指导乡村教育试验的理论，可以说是陶行知将它拿来在试验乡村教育过程中再加以检验，并使之向前发展的理论，也就是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说：“自杜威来华讲学，生活教育之名，已成为中国教育界之口头禅。”(《全集》2卷231页)但杜威并没有把自己的教育理论称为生活教育理论，他只是把自己的教育哲学叫做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经验主义，试验主义；教育理论界一般也把他视为实用主义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大约是因为他在华常讲教育即是生活，从生活本身学习，教师工作可以形成适当的社会生活，所以中国教育界便把他的这些主张，包括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等，

就通俗地统称为“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之定义”，陶行知说：“在晓庄开校前九年，我已提出，包含三部分，一是生活之教育；二是以生活影响生活之教育；三是为着应济生活需要而办之教育。用英文译出来，比较简单：Life education means an education of Life, by Life and for Life。”（《文集》653页）从1921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所讲Education of Life, Education by Life, Education for Life的大致内容看，其观点同杜威是一致的。1926年陶行知所讲师范学校的任务和建设过程，也应用了“教育即是生活”的原理。

1930年3月，陶行知说：“当初生活教育戴着一顶教育即生活的帽子。自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试行以后，渐渐的觉得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行不通了。一年前我们便提出一个生活即教育的理论来替代，从此生活教育的内容方法便脉脉贯通了。”（《文集》256页）

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陶行知1917年回国后，认为“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教授法，“有改革之必要”。（《文集》185页）1918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力主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19年2月，他在《教学合一》一文中提出，“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文集》14页）10月，又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事怎样做，就须怎样学”。（《文集》19页）1922年，他把两者连起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文集》185页）这就形成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但当时还没有定下教学做合一这个名词。1925年，他在南开大学讲演中阐述这种思想时，仍以“教学合一”为题，张伯苓提议改为“学做合一”。这下启发了陶行知，才定下“教学做合一”的名称。

这时陶行知所说的“教学做合一”，同杜威的“从做中学”，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差别。杜威也“认为教师教的方法，要以儿童学的方法为依据；儿童学习是通过各种活动来获取经验的。……因此，教

师实施教学，必须遵此而行，力求学生‘从做中学’。(罗炳之编著：《外国教育史》下册272页) 1925年，陶行知在南开讲演时，也曾赞同“从做中学”。(《全集》1卷595页)

那么，为什么晓庄师范试行“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会觉得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行不通呢？这是因为，1925年后陶行知通过调查研究 and 筹办晓庄师范过程中的种种思索，到1926年，他所说的“教学做合一”，已经向前发展，同杜威的“从做中学”不是一码事了。

以“做”为中心，是“教学做合一”和“从做中学”的共同点。然而，重要的是，“做”的目的、内容、方法是什么？正是在这些方面，1926年陶行知讲的“教学做合一”，已经和杜威的“从做中学”有了重大差别。

杜威提倡“从做中学”，是为了使教育能更好地适应美国工业社会的需要，为巩固和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陶行知试行“教学做合一”的目的，是要使教育为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创造一个富强的、平等的、他所谓的理想社会服务。

杜威“从做中学”里提倡的“做”，是园艺、纺织、木工、金工、烹饪等等活动，以及让学生摹仿社会，在学校里组织小市政厅、巡察团、商店、学校、银行、邮政局、电话局、卫生局、卫生宣传队等等。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试行“教学做合一”中的“做”，除了中心小学的活动、分任晓庄师范校务的活动之外，还有征服自然环境的活动和改造社会环境的活动。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把生活引进教育；正如1930年陶行知所说，仍然是“将教育和生活关在学校大门里。”(《全集》2卷199页)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把学校造成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也是关在学校大门里的。但是，晓庄师范的征服自然环境教学做，如帮助村民解决饮水问题，防治疟疾、天花、开办乡村医院，发动村民治螟捉蛇，组织村民武术会、举办联村运动会、修路、开荒、造林，组织农产品展览会等等；以及它的改造社会环境教学